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大風出版社

No. 2022~1

2022年1月17日

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爱因斯坦¹

一个既不是专门研究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人，却要对社会主义这个题目发表意见，这是否适当呢？从一些理由来看，我相信是适当的。

首先让我们从科学知识的观点来考查这个问题。天文学同经济学好像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方法论上的差别：这两个领域里的科学家都企图发现对一类范围有限的现象普遍适用的规律，尽可能地弄清楚这些现象的相互关系。但实际上，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别还是存在的。在经济领域里，由于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时常要受到许多很难分别开来估计的因素的

¹ 此文最初发表在《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创刊号上。这个刊物自称是“独立的社会主义者的刊物”，1949年5月创刊于纽约。这里译自《晚年集》123~131页和《思想和见解》151~158页。— 编译者（《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9，267~274页）

影响，使得要发现普遍规律就很困难了。此外，从人类历史上所谓文明时期开始以来所积累下来的经验——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在很大程度上决不是完全由经济性质的原因所影响和制约的。比如，历史上多数大国都靠征服别的国家而得以存在。征服的民族在法律上和经济上自封为被征服国家的特权阶级。他们夺取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并且从自己的队伍里派出教士。教士控制了教育，使社会的阶级分化成为永久的制度，并且创立一套社会伦理准则（a system of values），从此以后人民在他们的社会行为中就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觉地遵守着这套准则。

但是历史的传统可以说是昨天的事；无论在哪里，我们实在都还没有克服索尔斯坦·凡布伦²所说的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the predatory phase）。可观察到的经济事实都属于这个阶段，甚至我们能从这些事实推导出来的规律，也不能用到别的阶段上去。既然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克服并且超过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所以处于目前状况下的经济科学就不能说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其次，指引社会主义方向的是一个社会~伦理目的。可是，科学不能创造目的，更不用说把目的灌输给人们；科学至多只能为达到某些目的提供手段。但目的本身却是由那些具有崇高伦理理想的人构想出来的，只要这些目的不是死胎，而是有生命的，并且是生命力充沛的，它们就会被许多人所采纳并且向前发展，这些人半不自觉地决定着社会缓慢的进化。

由于这些理由，在涉及人类的问题时，我们就应当注意不要过高地估计科学和科学方法；我们也不应当认为只有专家才有权利对影响社会

² Thorstein Veblen, 1857~1929, 美国经济学家、作家和教师，长期任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编辑。他是技治主义的创导人之一。——编译者
技治主义，另译“制度经济学派”。

组织问题发表意见。

前些时候以来，曾有过无数这样的论调，说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一种危机，它的稳定性已遭到严重的损害。这种情况的特征是：个人对于他所属的集体，不论大小，都漠不关心，甚至有敌对情绪。为了说明我所讲的意思，让我在此讲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不久以前，我同一位有才智的并且是好脾气的人讨论下一次战争的威胁，我认为下次战争会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存，我说，只有超国家的组织才能防止那种危险，我那位客人却无动于衷，而且冷言冷语地对我说：“您为什么要那样强烈地反对人类的绝灭呢？”

我深信，在短短一个世纪以前，还不会有人那么轻率地讲出这样的话。说这话的人，他曾努力想达到自己内心的平衡，但无结果，并且多少已失去了成功的希望。这表示了在这些日子里多少人所遭受到的痛苦的寂寞和孤独。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难道真没有出路吗？

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容易的，但却难以给它们作出有任何把握的回答。不过我还是要尽力去试试看，尽管我非常明白，我们的感情和努力时常是有矛盾的，模糊不清的，不能用简易的公式把它们表述出来。

人既是孤独的人，同时却又是社会的人。作为孤独的人，他企图保卫自己的生存和那些同他最亲近的人的生存，企图满足他个人的欲望，并且发展他天赋的才能。作为社会的人，他企图得到他的同胞的赏识和好感，同他们共享欢乐，在他们悲痛时给以安慰，并且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只是因为存在着这些多种多样的、时常相互冲突的努力，才能说明一个人所独有的性格，而且这些努力的特殊结合就决定了个人所能达到的内心平衡的程度，以及他对社会福利所能作出贡献的程度。这两种倾向的相对强度很可能主要取决于遗传。但他最后表现出来的个性，它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人在发展中所处的环境，取决于他所成长于其中的

社会的结构，取决于那个社会的传统，也取决于社会对各种特殊行为的评价。对于个人来说，“社会”这个抽象概念意味着他对同时代人以及以前所有各代人的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的总和。个人是能够自己进行思考、感觉、奋斗和工作的；但在他的肉体、理智和感情的生活中，他是那样地依靠着社会，以至在社会组织以外，就不可能想起他，也不可能理解他。是“社会”供给人以粮食、衣服、住宅、劳动工具、语言、思想形式和大部分的思想内容；通过过去和现在亿万人的劳动和成就，他的生活才有可能，而这亿万人全都隐藏在“社会”这两个小小字眼的背后。

因此，个人对社会的依赖，显然是自然界的一个不能抹煞的事实——蚂蚁和蜜蜂也正是那样。可是，蚂蚁和蜜蜂的整个生活过程，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也都是由遗传下来的不变的本能所决定着，而人类的社会型式和相互关系却是非常不固定的，容易改变的。记忆力、重新组合的能力、口头交谈的才能，已在人类中间造成了一种不听命于生物学上的必然性的可能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传统、制度和组织中；表现在文学中；表现在科学和工程成就中；表现在艺术作品中。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影响生活，为什么自觉的思考和愿望能够在这种过程中起着作用。

人在出生时，通过遗传已得到了一种生物学上的素质，我们应当把它看作是固定的和不变的，这种素质包括那些作为人类特征的自然冲动。此外，在他的一生中，他也得到一种文化上的素质，这是他从社会中通过交往以及其他许多类型的影响而取得的。这种文化上的素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起变化，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同社会之间的关系。近代人类学通过所谓原始文化的比较研究告诉我们：随着主要的文化型式和社会中占优势的组织类型的不同，人类的社会行为可以相差很

大。那些企图改善人类命运的人就可以以此为根据，建立起他们的希望：人类**不是**由于他们的生物学的素质而注定要互相毁灭的，或者要听任那残酷的、自作自受的命运来摆布的。

如果我们问自己，社会结构和人的文化面貌应当怎样改变才能尽量使人类生活感到满意，那末，我们应当经常意识到，有些条件我们是无法改变的。如前面所提到的，人的生物学本性实际上是不会变化的。此外，最近几个世纪来技术和人口的发展所创造的一些条件，也已扎下根来。在定居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要为他们继续生存生产必需的物品，极细的分工和高度集中的生产设备都是绝对必要的。个人或者相当小的集团完全自给自足的时代——回顾起来，它似乎多么地有田园风味呀——已一去不复返了。只要稍微夸张一点，不妨说：人类甚至在目前就已经组成了一个生产和消费的行星公社。

现在可以扼要地说明我们时代的危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牵涉到个人对社会的关系。现在的个人比以往都更加意识到他对社会的依赖性。但他并没有体会到这种依赖性是一份可靠的财产，是一条有机的纽带，是一种保护的力量，反而把它看作是对他的天赋权利的一种威胁，甚至是对他的经济生活的一种威胁。而且他在社会里的地位总是这样，以致他性格中的唯我倾向总是在加强，而他本来就比较微弱的社会倾向却逐渐在衰退。所有的人，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全都蒙受这种衰退过程。他们不自觉地做了自己的唯我论的俘虏，他们感到忧虑不安、孤单寂寞，并且丧失了天真、单纯和淳朴的生活乐趣。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

照我的见解，今天存在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这种祸害的真正根源。我们看到在我们面前一个庞大的工商业界，它的成

员彼此在不断地拼命剥夺他们集体劳动的果实，这种剥夺不是通过暴力，整个来说，而是严格按照法定的条例去进行的。在这方面，重要的在于认识到生产手段——那就是生产消费资料以及附加的生产资料所必需的全部生产能力——可以合法地是，而且大部分已经是个人的私有财产。

为了简便起见，我在下面的讨论中，将把所有那些不占有生产手段的人统统叫做“工人”——虽然这并不完全符合于这名词的习惯用法。生产手段的占有者有条件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工人使用生产手段生产新商品，而这些商品就成为资本家的财产。这个过程的关键是在工人所生产的东西同他所得的报酬（两者都用实际的价值来计量）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合同是“自由”的情况下，决定工人的收入的，不是他所生产的商品的实际价值，而是他生活的最低需要，以及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同就业竞争的工人数目的关系。甚至在理论上，工人的报酬也不是由他的产品的价值来决定的；了解到这一点，是很关紧要的。

私人资本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这部分是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部分是由于技术上的发展和不断增长的分工促使更大生产单位的形成，从而牺牲了较小的生产单位。这些发展的结果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的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事实的确如此，因为立法机关的成员是由政党选出来的，而这些政党要不是大部分经费是由私人资本家提供的，也是在其他方面受他们影响的，他们实际上把选民同立法机关隔离开来了。结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实上不充分保护人民中无特权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家还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情报和知识的主要来源（报纸、广播电台、教育）。因此，一个公民要达到客观的结论，并且理智地运用他的政治权利，那是极其困难的，在多数场合下实在也完全

不可能。

因此在以资本的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中，最常见的情况是以两条主要原则作为其特征：第一，生产手段（资本）是私人所有的，所有者以他们认为是最恰当的方式来处置它们；第二，劳动合同是自由的。当然在这个意义上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尤其应当注意到，通过长期艰苦的政治斗争，对于某些行业的工人来说，他们已取得了形式上多少有点改善的“自由劳动合同”。但从整个看来，今天的经济同“纯粹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多大差别。

经营生产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使用。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凡是有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人总有就业机会。“失业大军”几乎一直存在着。工人经常受到失业的威胁。既然失业的和报酬微薄的工人提供不出有利可图的市场，消费品的生产就受到限制，结果造成巨大的经济困难。技术的进步经常产生的是更多的失业，而不是使劳动负担普遍有所减轻。追逐利润，加上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资本的积累和利用不稳定，从而导致日益严重的不景气。无限制的竞争导致劳动力的莫大浪费，也导致个人社会意识的消沉；这我在前面已提到过了。

这种对个人的摧残，我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祸害。我们整个教育制度都蒙受其害。人们还把夸张的竞争姿态教给学生，训练他们对好胜喜功的崇拜，以作为他们未来生涯的一种准备。

我深信，要消灭这些严重祸害，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配上一套以社会目标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这样一种经济制度里，生产手段归社会本身所有，并且有计划地加以利用。计划经济按社会的需要而调节生产，它应当把工作分配给一切能工作的人，并且应当保障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能生活。对个人的教育，除了要发挥他本人天赋的才能，还应当努力发展他对整个人类的责任感，以代

替我们目前这个社会中对权力和名利的赞扬。

然而应当记住，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还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

在我们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厘清社会主义的目标与问题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由于在当前的环境下，自由而没有阻碍地讨论这些问题被悬为厉禁，我认为这本杂志的创刊对公众是个重要的贡献。³

³ 商务印书馆 1979 年原书无最后一段，经核实英文原版，补上此段。